

王淑凤：情系高墙三十年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



王淑凤指着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他们的照片

很少有人记得1987年海兴县的那次公判大会。可王淑凤记得。那天，她就坐在主席台上。风一个劲儿地刮，带着渤海湾咸湿的味道。十几个小伙子被押过来，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。因为犯罪，他们被判不同的刑期。其中一个，被宣判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他的母亲白发苍苍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王淑凤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那位老母亲，眼泪也跟着下来了。风，冷而硬，吹在脸上生疼。当晚，王淑凤怎么也睡不着。一闭眼，就是老人的哭喊声和一张张年轻的脸。联想到参加的另一次公判大会上，面对即将执行死刑的孙子，满头白发的爷爷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她怎么也无法平静。她是县人大主任，也是一位母亲。那些孩子才多大呀？怎么就犯了法？全赖自个儿吗？难道家庭没有责任？学校没有责任？社会没有责任？她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。

1989年，海兴县成立关工委，王淑凤兼任关工委主任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她和身边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干部，开始走上帮教之路。1997年，王淑凤从海兴县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，彻底投入帮教团的工作中，一晃就是30多年。

三十一年尘与土，六万里路云和月。帮教这些年，她辗转风餐，辛苦倍尝，回首来时路，却始终无怨无悔。

为了谁，顶风冒雪而来

王淑凤所在的帮教团，有个特殊的名字：海兴“五老”帮教团。那是因为，团里多是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教师、老军人、老模范。干脆，就以“五老”为名了。

每到年底，是王淑凤和“五老”们最忙的时候：沧州、天津的五六所监狱，他们都要走一遍。帮教工作也曾遭质疑、被冷落。监狱领导最初以为他们是走过场，后来看到他们帮教的过程，心悦诚服地表示：“你们是真帮实教，对我们的工作太有帮助了，希望你们常来！”

有一回到天津滨海监狱帮教，正赶上大雪，王淑凤还感冒了。始终支持她的儿女头一次劝她别去。她说：“里面关着的要是咱孩子，去不？”说完，裹了件厚棉服就出发了。她知道，年根底下，几十名海兴籍服刑人员正眼巴巴地盼着她。

他们已经摸索出一套帮教方法来：先播放家乡面貌改变的视频，再播放家访时拍摄的服刑人员亲属的电视片，然后由狱方和帮教团代表发言，接下来给服刑人员每人一份礼物，最后是面对面交流。

礼物不大，却透着妈妈般的关爱，还各有寓意：这是肥皂，你们要洗洗脸；这是毛巾，你们要擦擦身；这是笔和本，你们要记下心灵日记……

位70多岁的老太太，顶风冒雪来到这里，为了谁？为了什么？还不是盼着你们好好表现，早日出去，重新做人？！如果不是心里装着你们，是不会对你们的家庭了如指掌的！”

是什么，让她们彻夜长谈

在沧州监狱帮教时，崔某引起了王淑凤的注意。崔某只有二十出头，面庞白皙，身体单薄，眼神中透着绝望和无助。临来前，王淑凤和监狱联系过，知道他是新来的，因为抢劫被判无期。他兄弟三个，大哥在外地谋生，弟弟被判死缓，在另外一家监狱服刑。感到前途无望，崔某情绪非常低落，几次试图自杀。

王淑凤笑着把礼物递到他手上，像三月拂面的春风：“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。”

崔某抬起头说：“我父母身体不好，身边又没人照顾，不知怎么样了？我可能再也报答不了父母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声音哽咽了。王淑凤很肯定地回答，没问题。崔某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她，说不清是信，还是不信。

几个月后，帮教团再来时，同行的竟然有崔某的父母！相见的那一刻，一家三口抱头痛哭。之后，崔某一扫沉闷情绪，在狱中表现越来越积极。

后来，崔某的父亲去世时，监狱破例允许崔某回家见他父亲最后一面。办完丧事后，崔某的母亲深受感动，主动要求现身说法到监狱进行帮教。那次帮教活动很成功，崔某泪流满面，表示一定积极改造，很多服刑人员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

回到海兴后，已经没有回村的公交车了，王淑凤邀请崔某吃住住在自己家。当晚，两个母亲抵足而眠，彻夜长谈。崔某倾诉了整整一夜，流了一夜的泪，有悔恨，也有孤独。一开始，她叫王淑凤大姐，后来一岁论岁，又叫大姨。临别时，她一个劲儿地说：“遇见您，我儿就有希望了。”

果然，崔某和他的弟弟积极改造，后来都减刑提前出狱了。看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又有了温暖和爱，王淑凤感到无比欣慰和幸福。

他们的事，必须一管到底

与崔某不同，戴某人入狱两年了，他的父亲连封信都没写过。

当王淑凤和“五老”们走进戴家时，一切都明白了。戴父是一位老党员，孩子出事后，除了恨，就是痛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生活也没了保障。戴某犯罪留给家人的伤痛，很长时间难以愈合。

看到戴父的情况后，“五老”们嘱托村干部帮忙为他办理低保。收到低保后，戴父高兴地说：“这就给孩子写信，让他痛改前非，好好做人！”戴父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：孙女即将大学毕业，学的是法医。老人想请他们帮忙找工作问题。

这可难住了王淑凤。不要说她都已退休多年，就是在职，也不敢打包票。老汉看出来，说：“要是为难，就算了。”要是自己的孩子，很可能就算了。自己的事儿，她从来不愿意麻烦人。可这是服刑人员的子女呀！既然叫他们一声“孩子”，他们的事儿，就得管，还要一管到底。

“五老”们找到县公安局。了解情况后，县公安局拍板儿：先让闺女来上班。

海风暖了，柳树绿了，桃花开了。穿上警服，女孩儿英姿勃勃。她拍了张照片，给父亲寄了去，还报告了一个好消息：她考上了公务员，现在已是正式干警。

生活有了希望，戴某在狱中表现越来越积极，还因为救人立了一等功。

2013年12月20日，戴某假释出狱了。出狱第一件事，是到海兴县老干部局看望王淑凤和“五老”们。他打算去天津塘沽重新创业。临走时，他说，以后再回去天津帮教，算我一个！

啥也别说了，跟我们走

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走进吕家的那一刻，王淑凤和“五老”们的心还是一下子沉到了底。

屋顶塌了一片，凛冽的北风直灌进来，炕上只有一帘席。吕某正蹲在地上抹眼泪。看见“五老”来了，他木然地站起来，目光浑浊无神。

王淑凤的眼圈儿红了。这样的家，还算家吗？

就在前一天，刑满释放的吕某来到县关工委，找到王淑凤说，自己出来了，但已经没家了。吕某，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过功，后因盗窃入狱，妻子和他离了婚，儿子寄养在亲戚家，不认他这个爸爸。

他们联系上村干部、镇干部，又把吕某的亲属们叫到一块儿，开了个协调会。“别的不说了，咱得帮他房子先盖起来！咱们有钱出力，有力出力！”房子很快就破土动工盖起来了！新房上梁那天，王淑凤来了。吕某流下了感动的泪水：“我没了娘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娘！今后我要是不好做人，就对不起你！”

临走时，王淑凤悄悄把他叫到一边，掏出一个信封塞给他：“你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拿着，跟谁也别提。”

房子盖好后，吕某计划去外地一家化工厂打工。王淑凤不放心，临行反复叮嘱，化工厂有毒呀，可别为了挣钱不要命！

再次见到他，是他第二次中毒躺在医院里。王淑凤说：“啥也别说了，跟我们走，工作的事，我们想办法。”她想起了戴某。戴某曾说在塘沽揽了个工程，手下有几十名员工呢！

电话打过去，戴某说，工程干完了，但又说，他给留意一下，也许别的单位缺人呢！

让王淑凤想不到的是，打完电话的第三天，戴某就开着车回海兴接吕某去塘沽上班了。他说，正好有个单位缺保安，活儿不累，就是钱少点。管吃管住，一个月2000元。

吕某听了，高兴地直说：“不少了，不少了……”他只身去塘沽时，身上只有40元钱，除了一套保安服，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。戴某给他留下1000元，让他应急用。

因为工作认真，吕某被任命为保安组组长，后来又成为副队长、队长。还因为保护单位财产立了功。他娶了媳妇，和儿子的关系也好了，一家人小日子过得和美……

工作之外，吕某一年无偿献血两次。病人家属非要给他报酬，他说什么也不要，只是说：“我受过别人的大恩，想报答，没机会，就让我回报社会吧！”

这一切，他都打电话告诉王淑凤，好像一个游子在向妈妈倾诉，他感到这样做心里才有根。

非要报答，就回报社会吧

在王淑凤身后，有个人一直在默默支撑。他，就是老伴儿呼金岭。

他是“五老”帮教团里年纪最大的一位，参加过抗美援朝。平时，帮教团里干活受累的事儿，他抢在前面；出头露脸的事儿，他一个劲儿地往后靠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这么硬朗的一个人，竟然病倒了。

即使在伺候老伴儿最后的那段日子里，王淑凤还经常接听刑满释放人员打来的电话。她的语调永远那么轻柔，像母亲一样，熨帖着他们那颗曾经躁动的心。

接听电话，是她与老伴儿之间的默契约定。每次看到王淑凤通过电话耐心地劝解对方，呼金岭就觉得真好，因为，那也是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呀！

2015年，呼金岭去世了。葬礼上，来了8个刑满释放人员，他们一致要求，为呼老披麻戴孝。

王淑凤不同意。他们说：“您和呼老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却无法报答。就让我们尽一点孝心吧！”

王淑凤还是不同意。她知道，丈夫和她一样，做这一切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不为报答，只为了自己的心。这份初心，属于她，属于丈夫，也属于帮教团的所有人。她要守住，无论何时何地。

葬礼结束后，戴某发来了短信：“沙发缝里有一万块钱，一定收下，是给伯伯办后事的。”

王淑凤让在塘沽工作的亲戚把钱原封不动退了回去。

后来，戴某生病，一度产生了绝望的念头。王淑凤让学美术的女儿给他画了一幅山水《鸿运当头》，鼓励他重燃生命的希望。

30年帮教路上，王淑凤遇到过多少戴某、吕某、崔某？答案是，太多太多了。每个人背后，王淑凤都有一长串和戴某、吕某、崔某一样感人的故事。30年帮教路上的这份精神厚度、情感深度，没有亲身经历的人，恐怕很难想象。

他们都记着王淑凤说过的话：“我们最盼望你们能自食其力走上正道。如果能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，就更好了。”

2014年11月26日，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。王淑凤作为省老干部先进集体代表，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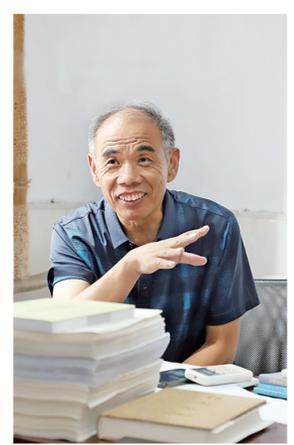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归来，她还一如既往地走在帮教路上。

最喜欢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每当这时，84岁的老人会像孩子似的张开双臂，和阳光来个大大的拥抱。然后，开始新的一天帮教。

为探寻泊头历史，近20年里，他创作整理了上千万文字，成书36套——

范凤驰的文化苦旅

本报记者 周红红 杨金丽 杨静然 摄影 魏志广



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当地历史文化研究上。

可在整理挖掘史料时，他忽然意识到，有些知情人已年近古稀，再不抓紧时间整理，有些东西恐怕就永远湮灭了。于是，深植于范凤驰心底的文化意识被唤醒，他开始行走在运河两岸。

那时候没有汽车，出行全靠一辆自行车。出行前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每到一村，他就把年长的老人聚到一起，在他们的记忆中拼凑出村子的历史、名人、奇闻轶事、古墓遗址等。就这样一村一村地行走，历时5年，45.5万字的《泊头文史丛稿》和40万字的《泊头人文概述》两书诞生，内容涵盖泊头与运河的发展史、文物古迹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，填补了泊头历史的空白。

所爱即事业，这大概是范凤驰生平最幸运的事，即使耗费一生的时间，他也欣然前往。

这位63岁的泊头文化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对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。后来，这份初心又融入了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，使他全身心投入其中。

近20年里，范凤驰写下了千万余字的珍贵史料。在他的走访、梳理下，一个个湮灭在历史烟云中的事物、事件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痴迷读书 对文史研究情有独衷

沿泊头市裕华路一直向西，七拐八拐进了一座老小区。范凤驰的工作室就在这里。打开房门，满屋子都是书。书架上，是泛黄的老书本、历史资料，卧室、客厅里则是些新书，以及他已经出版的书。说是工作室，其实与“家”无异。除睡觉外，范凤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这里，或读书写字，或沉思冥想。

桌上，是还未正式出版的《城工部在泊头》手稿，详细叙述了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历史沿革。

“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，是负责平津一带城市地下工作的机关，它在平津战役及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……”说起那些红色故事，范凤驰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这本书30万字，从接到编书任务到整理完成初稿，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。其中，我采写了上百万字。”他说。

高效率的背后得益于范凤驰对泊头文化的熟悉于心。千年历史，早已深深地融入他的身体和血脉。

从河间师范学校毕业后，范凤驰走上讲台，一干就是12年。期间，他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学习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，从唐诗宋词到现代文学名著，这也为他后来从事历史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1988年，他被调往泊头市委办公室，每天埋首公文，写作水平不断得到锻炼提高。工作以外，范凤驰开始尝试写文化评论，《唐代送别诗的结尾例谈》《李清照词的达情手法》《评〈白鹿原〉》等一系列文章见诸报端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范凤驰把目光投向了泊头当地历史。“泊头历史上，有两条官道、两座驿站，交河县境内有4座古县城遗址，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。”他越了解越发现，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历史底蕴深厚，还有这么多亟待挖掘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此外，范凤驰还兼任文联主席，出版了《汇水诗稿》《旅痕无垠》等多部诗集和散文集。

范凤驰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，或读书或写书，逢年过节也不例外。在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他写下了超过千万字的恢宏著述，为泊头留下了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苦心孤诣 守望乡土文化

2002年，范凤驰调任泊头市文化局局长。他终于可以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业，将全部



“五老”帮教团获得的各种荣誉